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 “五四”九十周年祭 >>

13位ISBN编号：9787506295697

10位ISBN编号：7506295695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杨念群

页数：1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 前言

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

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

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入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有资格赶此大集的理由来。

详细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自会品评，不用我在此啰嗦。

不过，既然赶集的人历来如过江之鲫，近年名门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迹其中，还是得先辨明自己是哪一路的鬼怪才好。

否则刚踏入门就被乱棍打出，不但失了身份还失了资格。

逡巡良久，才在下面简要列出些以往“五四”研究的八股信息和我的批评态度，交由读者来评判我赶“五四”这趟集是否合法。

八股一：“五四”被当做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

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

##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 内容概要

本书的探讨缘起于中国话语界长久以来对“五四”运动存在着的三种单一化的解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以及以捍卫国学的名义否定“五四”批判精神的遗老遗少式的悲剧式论调。

以此为背景，作者通过把“五四”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的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并在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长程中，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边缘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主流话语圈的过程。

本书不仅讨论了“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而且通过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特别着力研究了“五四”前后不同知识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描述了一幅充满地域和代际差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智识图景。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主编，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著，2003）、《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2004）、《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2005）等。

兼任中华书局出版《新史学》丛刊学术召集人。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1.1 引言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1.3 修正途径：“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 1.4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1.5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第二章 “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2.1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 2.2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 2.3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 2.4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第三章 “五四”意识的转变：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同 3.1 以“社会”解构“国家” 3.2 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是如何被重构的 3.3 身份认同的难局 3.4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第四章 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 4.1 地方自治的含义 4.2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4.3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出版后记

## &lt;&lt; “五四”九十周年祭 &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1.1 引言 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

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

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

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换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大概是已难忍祭典演出的仪规陈旧乏味，拜辞俗腔滥调，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不是这两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员的演技太差，出场频率过高反而会倒了观赏者的胃口。

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还有个大明星叫“费小姐”（自由），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

“五四”解释学自进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来，就一贯难脱政治史解读的窠臼，标准的党史叙事习惯把“五四”看做是一场相对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五四”犹如薪柴燃料，点燃了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熊熊火焰，它漫天辉映着，遥遥与作为近代革命之开端性标志的鸦片战争相呼应，“五四”的作用就是把自己变成中国近代史叙述末端的一个句号。

自“费小姐”登场并日益走红以来，大多数的“五四”研究才开始转向，试图把它解释成一场触及中国人灵魂和精神变化的“文化改造运动”，对这场运动的一个最佳描述就是“人的觉醒”。

周策纵先生那部“五四”研究的名著英文名字就直截了当地说“五四”是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意思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思想革命。

既然是“思想革命”，就不是短暂的政治运动影响力能够说明的，而是具有一种持久的精神召唤力量。

当年胡适也特别强调“五四”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强调那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

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孙中山的看法比较接近，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故胡适也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甚至称“五四”是中国发生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The Chinese Renaissance），大意也是如此。

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觉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

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持续大受热捧外，“德先生”和“费小姐”每回上台虽粉妆依旧，台下却仍觉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费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乱世狼烟中惊骇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见登台；“赛先生”则被持续追捧，终获升格为治国要策。

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忽然发现，没了“德先生”和“费小姐”的帮衬助演，“五四叙事学”就如双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两只，成了跛脚的瘸子。

因为过度提倡“科学”乃至到了崇拜至极的程度往往都是以反传统为代价的，“科学”救国的口号人人能喊，可无论精英还是大众，对人文的悟解和感受能力却在普遍退化，又何谈人的觉醒？

恰在此时，台湾“五四”研究的观点被高速引进大陆史学界，台湾史界秉持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传统，即把个人的觉醒看做是“五四”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想以此消解“五四”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

甚至有人认为，对“五四”个人主义觉醒是维护还是否定应该成为评价其研究价值的最重要依据。

这个解释思路对于那些刚从极“左”意识形态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大陆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一时间“自由”的旗帜到处猎猎飘扬，其凯歌行进之势，大有并吞思想八荒的势头。

不应否认，个人主义的觉醒确实是“五四”时期知识精英所阐扬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题。

但我以为，不可忽视的是，“五四”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而

## &lt;&lt; “五四”九十周年祭 &gt;&gt;

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

从研究价值上而言，两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但大陆史学界却基本不假反思地直接承传了自由主义的解释方法，个人觉醒程度不但几乎被推许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且是推进还是干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成为衡量“五四”以后历史变迁之得失的标准。

甚至有人更为极端地认为，民族主义式的救亡理念和“社会改造”运动压抑了个人解放的顺利实现，并最终导致“五四”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

这种把“个人觉醒”与“社会改造”运动对立起来的做法，基本上搬用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原则，却未必适用于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解释。

因为“五四”以后“社会改造”运动不但成为了历史的主调，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也深刻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日益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并非只构成了“觉醒”和“压抑”的简单对应关系。

在近二十年的“自由主义”叙说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期间流行的“反传统”思想造成的文化真空导致了“五四”自身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危机，由此酿出的悲剧情绪已逐渐盖过了倡扬“五四”为现代革命起源的浪漫狂喜，甚至“五四”精神还须为“文革”灾难负起沉重的历史责任。

于是，否定“五四”的批判精神又渐成当代的时尚话题，捍守“国学”的新“冬烘”们仿佛从冬眠中苏醒，趁机重施雅黛粉墨登台，大扮起了遗老遗少。

至此，由“五四解释学”构筑起的瑰丽圣殿顷刻出现了崩裂瓦解的态势。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说到“五四”的整体叙事格局，我在前面已简单勾勒出了一个轮廓，这一画面显示出，九十年来史学界构筑“五四叙事学”，除少数讲法一如既往地飘扬乐观的高调外，大多已流露出悲观抑郁的腔调。

起因无非是说“五四”的反传统反过了头，造成了“自由主义”前途的黯淡与“科学主义”猖獗的谬误，于是“五四叙事学”的旋律充满了忧郁感伤，音调悲怆地反复谴责假借现代话语暴力群殴传统，造成权威流失的惨象；或者慨叹个人自由之身殒丧于挽救危亡的圣战之途，分别把“五四”的悲剧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缘的伤害。

既然悲情调子已定，那么大家尽可删繁就简各取所需地吹拉弹唱，不过主调大多都是探询人性觉醒努力的失败。

内因论影响最巨者甚至提炼出了一个异常简化的公式，这公式大体是说，“五四知识精英”之所以激烈地全盘反传统，是因为骨子里有一种“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遗传。

古代的文人习惯先处理文化问题，然后再考虑政治制度的建构，或者用处理文化的方式应对政治社会问题，这样的方法在过去有效，但拿到近代就完全失灵。

结果，“五四”青年用传统反传统，就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据说“思想优先”的处事办法是由孟子发明，一直流传到“五四”。

这公式虽简化得让人起疑，却精明地概括了半部中国思想史，何出此言？

宋代以后，是理学发威的时代，士大夫一度形成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表象，靠的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与皇帝沟通。

也就是说直到宋代以后，那些旧的知识精英宣称自己得了秘法心传，可以讲一套道德教化的道理去“正君心”，皇帝也相信自己道德修养的高低会影响政治制度的运转，与是否坐稳江山大有关联，这样那些士人就开始有了密集出入宫廷的机会，他们由此自信满满地认为不但可以教育小孩，还可教育皇帝。

但并不是说孟子时代的王者就已经那么容易说服，宋代以前的皇帝基本不相信教化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更相信“天”的旨意，比如地震和灾祸的示警作用，按照学术界的说法是受“天谴论”的支配，大体说孟子的“道德主义”到宋代才被重新发现和有效地加以使用。

至于宋以前士人是否用“思想优先于政治”的看法去解决问题就很难加以证明了。

这种道德教化优先的方法不能说在近代中国没有表现，比如康有为策动晚清的变革运动，在处理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时，采取的仍是用道德完善催化制度变革的办法。

##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他以为只要光绪帝一个人的道德修为够高，就自然会泛化推及到政治制度的变革，甚至无视光绪帝是个无权无势的傀儡这个显著事实。

在今天看来，康氏似乎傻得可笑，可是如果放在“道德优先”的历史传承脉络里就会理解其行为的正当性。

不过借此例子断定近代的知识人都如康氏这般天真可爱却大可怀疑。

应该承认，这种把“五四”思想概括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论述是颇具吸引力的，尤其是其叙述风格兼具哲学论辩的形式美和音乐韵律的节奏感，亦不乏相当的历史证据作支持。

但我脑子里至少有两点疑问：第一，以“道德教化律”连续涵盖整个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的思维是否有效？

这样做的风险是首先必须承认儒学“普遍化”到可以时时不间断地发生效用，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某些原则，如“道德教化律”可能只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之内才是有效的，换个时期就难说了。

特别是西方高度“入侵”后“道德优先”的原则是否可以作为影响士人的绝对思维条件就更加可疑。

第二，儒学即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可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续支配着身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知识精英，也令人怀疑。

与此相关，儒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皇帝的行为施加影响也要打个问号。

有一种说法是，儒生不间断地把道德修身的教条灌输给皇帝，他们强调用个体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并相信其具有超绝的力量，故而导致皇帝道德负担过重，以至于无法应对整个帝国日趋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最终在西方入侵之下难逃失败的命运。

这种推断把古代中国的衰落归结为“道德主义”的无孔不入，似有夸大文化思想作用的嫌疑。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儒学一旦转换了生存的场所，就很容易变得面目全非，难以用普遍整体的观念加以把握。



##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 编辑推荐

“五四”不是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

“五四”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也不应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

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将“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否视为“五四”成败的唯一标准，毫无意义。

“五四”不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它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我们无法回避。

<< “五四”九十周年祭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